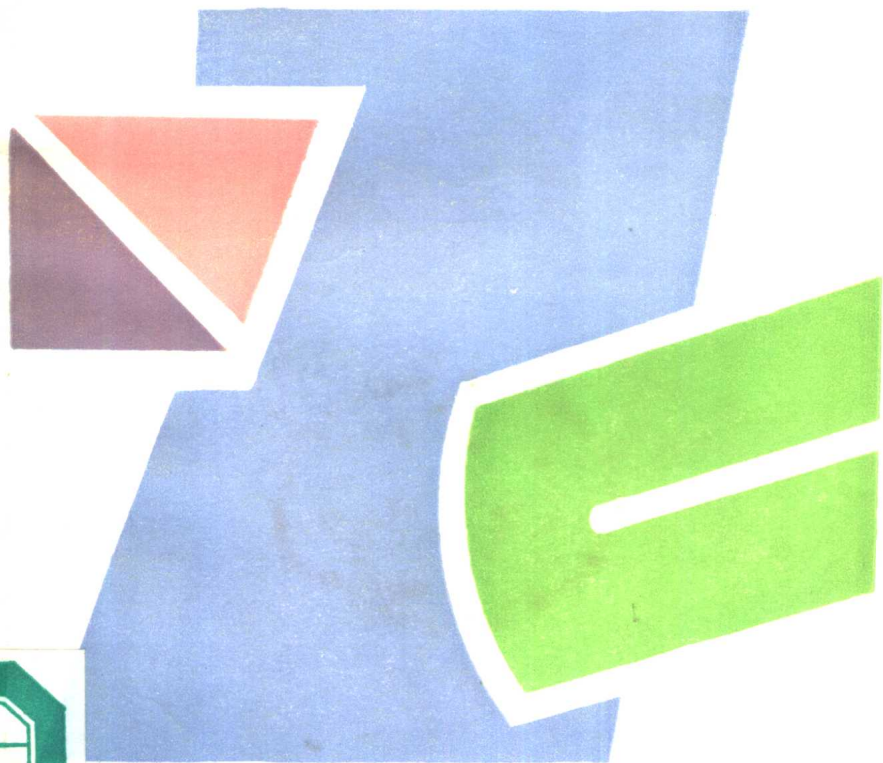


点 火 失 利

经济学者对社会的警告

主编 韩朝华

梁 树 春 著



《经济学者对社会的警告》丛书 主编 韩朝华

点 火 失 利

梁树春 著

学 苑 出 版 社

责任编辑 嵇浩存
监 印 夏书林

《经济学者对社会的警告》丛书

点 火 失 利

梁树春 著

*

学苑出版社出版

（北京市西四颁赏胡同4号）

测绘出版社印刷厂印刷

天津新华书店业务开发部发行

*

1989年3月北京第一版 开本：787×1092 1/32

1989年3月北京第一次印刷 印张：4.25

印数：00001-50000册 字数：95千字

ISBN7-80060-310-5/F·37 定价1.55元

《经济学者对社会的警告》丛书

顾 问	厉以宁	周叔莲
主 编	韩朝华	
副主编	张润峰	

作者小传

梁树春，男，1964年5月生。1987年毕业于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获经济学硕士。现在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所宏观管理室工作，任全国土地经济研究会副秘书长，是国家“七五”社会科学重点科研项目“农村经济发展模式比较研究”课题组负责人之一。曾发表过《中国现代化农业模式的选择》等论文。

前 言

从 70 年代末至今，十年改革，十年探索，中国经济的发展模式和管理体制经历了许多变化。这些变化新旧杂错，真假共生，良莠并存。它们扑朔迷离，虚虚实实，有时使人觉得胜利在望，有时又令人感到困惑莫明。中国在改革和发展过程中到底取得了怎样的进展？中国经济的前景究竟如何？这是每一个关心中国现代化的人渴望了解的问题。

《经济学者对社会的警告》丛书是描述和分析中国经济现状和改革态势的系列著作。它所探讨的都是当前中国经济所面临的最具紧迫性、根本性和危机性的问题，是社会各界关注的热点。丛书的作者是一批年轻的经济学博士和硕士，他们是青年，热血沸腾，怀着一颗拳拳爱国之心，敢于直陈利弊；在现代经济学领域中，他们学有所专，训练有素，对当代中国经济有独到的研究和认识。他们支持改革，但对现行的各种改革思路和方略不尽赞同；他们研究改革，但与当前学术界的主流学派有明显区别。他们有独特的透视角度，新颖的分析思路。他们对中国经济现状的描述和分析不仅富于现实感，而且带有批

中国人素好浓描成功，淡写失败。看“主流”，列功绩，报喜不报忧，似乎成了部分中国人反映现实的准则。中国人惯于今是而昨非。苛责前代，溢美当今，把眼前的困境和难

题归咎于前辈，则又是某些人评论现实的规矩。中国人擅长乐天知命。随遇而安，得过且过，以不变应万变是中国人应付现实的方式。然而，当今的时代是以竞争定地位的时代，当今的世界是靠经济、科技实力论输赢的世界。中国要在这样的时代、这样的世界里争一强国地位，必须在把握现实的方式上消除根深蒂固的阿 Q 精神、官场习气和士大夫心态，树立敢于正视现实、批判现实、变革现实的社会人格。

《经济学者对社会的警告》丛书崇尚对现实的正视、批判和变革。它不迷信书本，不盲从权威，不粉饰太平，不危言耸听。它从中国经济政策和战略的实际社会效应出发，运用现代经济科学的最新成果，考察当前中国经济面临的困难，分析中国经济体制和经济战略的得失，探寻扫除障碍的途径。

《经济学者对社会的警告》丛书不是研究纯学术问题的艰深专著，而是面向社会各界的通俗读物。它的宗旨是将青年学者对中国经济现状和前景的最新思考推向社会。它为一切关心中国现代化但不熟悉现代经济理论的人士服务。这套丛书资料翔实，分析严谨，文字晓畅，既富于科学性和开拓性，又具有大众性和可读性。每一个勤于思考社会问题的读者都将从这套丛书中受到启发。

这套丛书的作者都是在各自专题领域中的独立开拓者。在对一些问题的认识上难免存有分歧。我们认为这是好事，分歧可以引起争论，启迪思路，正是这种不一致性才可以为读者透视中国经济提供一个多维的参照系。而一切结论性分析都将属于读者自己。

韩 朝 华

1988 年 12 月于北京

目 录

引言.....	(1)
第一章 困境：在繁荣的表象背后	(5)
1-1 被紊乱引归原点	(6)
1-2 发展的障碍	(17)
1-3 巨大的难题	(22)
第二章 探源：农业问题的症结	(39)
2-1 二元格局的强化	(39)
2-2 短暂的繁荣与危机的回归	(47)
2-3 波动及实质	(54)
第三章 反思：跳板与瓶颈的选择.....	(58)
3-1 发展的回顾	(58)
3-2 农业发展是经济起飞的初级推进器 ...	(71)
第四章 策略：如何改造传统农业.....	(97)
4-1 农业发展模式	(97)
4-2 农业发展的一般条件	(101)
第五章 出路：我们该怎么办	(112)
5-1 调整经济发展战略	(113)
5-2 深化农村改革	(118)
5-3 加快城市改革步伐	(127)

引 言

当前的世界有个最大的特点，这就是一方占世界人口比重很低、为数很少的高度发达的现代化国家，另一方却是占世界人口比重很高、为数众多的贫穷落后的不发达国家。世界发展严重不平衡，形成了鲜明的两极对照。就在许多发展中国家还在为生存与发展而艰苦奋斗、忙忙碌碌之时，世界的那一边却早已步入了信息社会。摆在发展中国家面前的唯一出路就是加速经济发展，早日实现现代化，否则将被开除球籍，被时代所遗弃。但是，如何实现现代化却是每一个发展中国家的政府所面临的重大难题。中国，这个当代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同样也摆脱不了命运的挑战。

中国是四大文明古国之一，中华民族有着悠久的历史 and 光辉灿烂的文化，为世界人类发展做出了重大贡献的四大发明有口皆碑，肥沃的土地、勤劳的人民、大一统的体制曾造就了中国发达的古代农业和中古代经济的高度繁荣。中华民族悠久而不曾中断的伟大文明象火炬一样燃烧在世界的东方，在整个中古时代，这一炬曾是那样的明亮。

15 世纪后，西方中世纪的黑暗开始结束，近代文明的曙光出现了。18 世纪英国爆发的产业革命迅速改变了世界的面貌。资本主义制度的迅速确立使时代以一日千里之势进步。

但中国封建社会依旧迈着不紧不慢的步伐，当 19 世纪中叶西方的鸦片和炮舰打开了中华帝国的大门时，中国封建社会的政治、经济、社会、文化领域中的资本主义因素仍微

乎其微。

西方的炮舰和战火促进了中国向工业社会的缓慢过渡。然而，没有政治独立的现代化在世界上是没有先例的。

解放后，中国人民在共产党的领导下，依托重工业化战略迅速实现了初级工业化，建立了一个比较完整和独立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但也为此付出了沉重的代价。畸形的城乡结构、落后的农业、贫困的农民、凋敝的农村无时不在困扰着我们的政府。1978年开始的农村改革，使衰退多年的国民经济迅速启动，起死回生，但不久又陷入了危机的境地。薄弱的农业再次成为国民经济发展难以绕过的巨大障碍。从长期看，农业面临着更严峻的形势，这就是迅速增长的人口、刚性增长的需求与资源匮乏，农业发展动力不足农业剩余劳动力转移缓慢相互交织所造成的巨大压力和难题。

中国始终在工业社会大门外徘徊。贫困和落后的幽灵久久在中国大地上空盘旋而不肯离去。这究竟是因为什么？

近年来，中国大地上空掀起了一场自“五四”运动以来规模最大的文化反思浪潮，有些同志把现代的不发达归罪于老祖宗的传统儒家文化。的确，中国的儒家文化中有一些阻碍现代文明生长和发育的糟粕因素。但是，上述评价是极不公平的。因为老祖宗没有控制和操纵着后人的一切选择和行为。

新加坡领导人认为，日本和“亚洲四小龙”之所以能在经济上获得成功，亚洲价值观的作用是重要原因。这些国家和地区都在“儒家伦理”圈内，他们的价值观主张个人必须为国家和群体利益做出牺牲，而个人则最终从群体成功中获益。节约和上下一致的群体精神推动着国家的前进。吴作栋第一副总理说：“我们是源远流长的亚洲文明的一个部分，我们应

该引以为荣。”

看来，问题并不在儒家文化。

从世界范围看，大多数发展中国家在“赶超”与“增长热”的引导下，也曾片面强调工业化的重要性，忽视或牺牲农业的发展，对农业采取了歧视的政策，因而也走过了一条艰难而曲折的路程，经济虽有相当发达，但与发达国家的差距不但没有缩小反而又拉大了，进入了“发展陷阱”。到目前为止，走出困境而步入上中等收入国家（和地区）行列的仅仅是少数。竟然同中国结局一样，殊途而同归。

人们不禁要问，这究竟是因为什么？出路何在呢？

为此，许多国家的政府和学者们进行长期的研究和探讨，提出了种种解释。其中最重要的也是大家所公认的一点就是发展中国家制定和实施了不合理的经济发展战略，片面强调发展工业的重要性，因而忽视了农业发展的重要性和必要性。他们只看到了发达国家的工业化，但却不知道发达国家的工业化都是在农业打下坚实基础和迅速发展的前提下完成的。当然石油输出国和城市化国家例外。

农业曾经哺育了古代社会文明。那么，它还能造就现代文明吗？回答是否定的，因为现代文明是以工业革命为标志的，现代化必然要通过工业化来实现。但现代化却又不简单地等同于工业化，经济发展必须以农业发展为前提，农业发展是推动现代工业扩张、宏观经济起飞的发动机，是经济发展的必要条件。现代化农业是经济增长的第一级推进火箭，忽视和牺牲农业发展必将推迟经济起飞的时间。农业与现代工业是一种相互依存、相互促进的关系。

解放以来，我国农业取得了很大成就，但仍是国民经济中最薄弱的环节。我们虽然制订过许多合理政策和措施，如

按农轻重顺序安排国民经济投资，提出了“农业是国民经济的基础”等响亮口号，但却总是写在纸上，挂在嘴上，干起来就忘。

我们的出路何在？首先，农业问题必须引起政府当局的高度重视。其次，应深化改革，采取正确措施来促进农业发展，否则我们将永远无法摆脱不发达的命运。

第一章

困境：在繁荣的表象背后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国农村开始了一场前所未有的重大变革。随着农业生产责任制的推进和逐步演化，确立了农业中家庭经营的主导地位，原有的没有生机和活力的集体经济组织解体了。农业微观经营组织形式和农业管理体制的改造，加上农产品价格的大幅度调整，极大地调动了八亿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农业生产迅速恢复和增长，死水般的国民经济也奇迹般地起死回生，大江南北、长城内外，呈现出万象更新、蒸蒸日上的景象。中国人再也不必为填不饱肚皮发愁了，人们的脸上露出了幸福的微笑。国内外一片惊呼：“中国的农村改革取得了巨大成功。”正当人们对改革额手称庆时，高速增长国民经济和农村经济背后却出现了阴影。在1984年农业出现创历史纪录的大丰收之后，农业形势直转之下。1985年粮食生产出现了建国史上的第二次大减产，并连续4年处于徘徊状态。其它农副产品的生产也出现了大幅度的波动。全国工业与农业产值年增长率之比由“六五”期间的2:1变成4.5:1，并且这种差距还在拉大。农村流通领域一片混乱，到处充满矛盾和摩擦。农村第二步改革也陷入进退两难的境地，国民经济发展和体制改革遇到了来自农业的强大阻力和障碍。这就是农业危机的出

052433

现。同时，我们更要清醒地看到，中国农业长期发展面临着更严峻的挑战。我国农业必须在加快农业剩余劳动力转移的前提下，在人口迅速增长、资源匮乏、农业后劲发展不足的基础上，生产出更多的农产品来满足高速增长的消费需求。危机和难题构成了中国农业发展的困境。

1-1 被紊乱引归原点

农业危机涉及到了整个产业领域的各个环节，它不仅表现为农业产出的停滞，还表现为新旧体制的严重冲突和对立，新体制的建立步履艰难，而旧体制有回归、强化的迹象。

1. 生产滑坡，恢复统派购

1982~1984年，我国棉、油、粮陆续饱和，超过了消费需求，形成了低水平过剩，出现了“库容”、“仓容”危机。面对这种形势，许多政府参谋人员的判断是：这一重大变革，不仅标志着历史上以粮食为首的主要农产品长期紧缺的被动局面得到了根本的扭转，而且意味着在今后一段时期内，我国主要农产品的增长速度很可能主要来自需求方面的制约，农业今后将由超常规增长转入常规增长。●有的同志还认为，即使1985年全国不生产一斤棉花，现有库存也足够工业生产用一年半时间……。为了解决生产过剩及其带来的严重财政危机，减轻国家负担，只有深化改革，用市场机

● 国务院农研中心发展所，《走向现代化的抉择》，经济科学出版社，1987年，第16页。

制来调整农村产业结构，而当时似乎又是实行这类改革的最佳时机。在这种思想的指导下，中央政府于1984年底做出选择，改革统派购制度，引入市场机制，实行价格双轨制和农产品合同定购制，价格按“倒三七开”。但是，早在1985年中央1号文件下达前的1984年秋天，粮食播种面积就在迅速减少，如小麦播种面积减少538万亩。这种情况的出现主要是由于1984年粮食大丰收导致的卖粮难以及市场粮价跌到了几乎不值钱的地步：玉米8分钱一斤都没有人要。这就是说农民已抢在政府之前对过剩作出了反应，粮食的低价格、低收益必然带来粮食产量的下降并影响农民完成国家任务的热情。合同定购任务难以落实使政府预感到问题的严重性，立即采取强制性行政措施来保证所谓“合同”任务的完成，转眼间合同定购又变成统派购。许多农民气愤地说：“什么合同定购，合同定购简直比统购还统购”。在收购季节，一些地方竟出现了由公安、粮食等政府部门组成的“抢粮队”、“催粮队”，翻箱倒柜，强行拿走农民的粮食。干群关系极度紧张。如果说1985年粮食大减产有一半责任归因于播种面积的减少，那另一半则是由单产降低引起的，而这能说是天灾引起的吗？到今年为止，粮食产量仍未恢复到1984年的水平，这又做何解释？

经济合同是经营者双方在自愿互利的基础上签订的一种契约，它具有法律效力，是双方经过谈判达成的一种相互妥协的产物。在我们的政府与农民签定的合同从来就不是什么真正意义上的规范化的合同，它不是建立在双方自愿的基础上。双方的地位、权利和义务是不对称的。这样的合同只规定了农民应尽的义务和责任，而没有国家应承担的责任。

中国农民素有以积极交售爱国粮为荣的传统。但近年来

这种积极性越来越低。山东省莱州市农调队对 482 位农民进行的问卷调查表明，持不得不交态度的占 29.46%。据了解，1985 年全国合同定购粮食任务 1580 亿斤，实际落实 1538 亿斤，差 42 亿斤。四川省只完成合同定购任务的 50%~60%。今年，由于农副产品收购资金短缺，收购工作进展极其缓慢。有的农民在春节对联上写下这样的话语来表达他们的心情：“高价化肥我不买，平价粮食我不卖——政府莫怪”。1985 年棉花也大幅度减产。一度供过于求的局面转眼间消失得无影无踪。昨天我们还在为农产品“多得不得了”而发愁，今天却因产品不足而犯难。

总之，靠市场机制来调节农村产业结构的构想没有实现。农业生产的不断滑坡，使许多大宗农产品不得不退回到原来的统派购轨道上。1988 年在天灾人祸的夹击下，政府宣布加强粮食市场管理，限制其自由流通和买卖行为。

2. 食品价格腾跃，城市居民“牢骚满腹”

农业停滞和徘徊，流通秩序混乱、宏观调控不力，使近几年来食品价格迅速上涨。上涨幅度之大，速度之快，达到了城市居民难以接受的程度。不断席卷全国的抢购风加剧了全社会物价总指数的上涨，并使相当一部分居民的实际生活水平下降。街头、巷尾，办公室和家中，物价成为人们关注和议论的中心问题。“菜篮子”问题成为许多市长们最头痛的问题。在各个地方我们经常可以听到这样的议论：“政府是干什么吃的？政府还能不能管得了这个市场？”、“宁肯工资不涨，也不要物价涨。”许多老同志十分怀念毛泽东时代的低工资和低物价，有的人说：“还是毛主席能，有办法”。

我国物价改革的一项基本原则就是放开。认为似乎只要把市场放开，价格提高了，就会迅速刺激生产，短缺就会缓

解，一切问题都会解决了。但事实上问题并没有这么简单。农产品生产受到许多条件的限制和制约。

1986年末全国集市粮价上涨幅度是近十几年来最高的，12月份同1月份价格相比上涨29%，秋收后涨价幅度更大，占全年涨价幅度的53%。1988年1~3季度全社会零售物价总指数比去年同期上升16%，32个大中城市职工生活费用价格指数上升18.3%，扣除物价后生活费实际增长0.5%。1988年全国大中城市陆续实行“暗改明”物价补贴措施。武汉市四月份措施出台，胴体猪肉由2.8元/公斤上升为4.12元/公斤，增47%；长沙市冻肉由3.2元/公斤增为4.2元/公斤，上升31%；郑州大路菜价格由0.374元/公斤，涨为0.514元/公斤，增37%。价格放开的结果之一是失控，而并没有出现在较高水平上的稳定甚至下降。许多人盛赞广东省的放开价格的经验，但却忽略了两个极重要的事实：第一，广东是全国超前改革试验区，享有许多特殊的优惠政策，如可自行调节农业生产结构，广东市场许多品种种类的农产品的丰富是建立在外省物资大批入粤的前提下，在一定时期内农产品的生产数量是有限的，你占得多，他人占有的必然少。在这种“蛋糕是一定”的条件下，全国物价放开的结果是可想而知的。广东省与湖南、江西、广西的生猪大战就是证明。第二，政府的巨额补贴。这两点是许多省、市、区根本不具备的。

3. 愈补愈多，国家财政吃不消，企业利润急剧减少

我国城市居民享受着“高就业、高福利、高补贴”的特权，国家通过补贴和转拨性支付来支助城市家庭消费，政策严重倾斜于城市。“一五”时期以后，城市居民工资虽增长不快，但形形色色的补贴却愈来愈多，如粮油、副食、水电、

住房、洗澡、理发、交通、卫生等补贴不一而足，逐步形成了一个庞大的城市福利体系。物价补贴是其中的重要一项。

传统农产品购销体制是一种价格倒挂型，即国家以较低的价格从农村收购农产品，然后又以低于收购价的价格供应给城市消费者。二者的价格差由国家财政负担（补贴）。1985年农产品收购体制改革，与其说是因为生产过剩，不如说是国家财政的补贴负担到了难以忍受的程度。但这个包袱并没有甩给城市，而是由农民负担了。物价的补贴在1984年达到最高峰为320.85亿元，1985年后逐步减少，1985年为274.92亿元，1986年为243.88亿元，分别占同年国家财政收入的21.36%、14.73%和10.79%，巨额的补贴压得国家喘不过气来。

副食品价格放开后，国营商业部门由于多年形成的官商作风难以一时消除，自身的负担也很沉重，因此，国家对城市的“暗补”没有取消，反而又增加了“明补”。为了保证和稳定城市居民的生活水平，政府、企业分别采取了以下对策和措施：

(1) 增加职工副食品补贴额。1985年北京居民补贴额为每人每月7.5元，现在又增加10元。广州副食品价格放开后，人均月补贴额增加12元，粮油销价提高后又增加8.44元。

(2) 增发工资、奖金和实物。1984~1986年，城市职工全员劳动生产率平均年递增6.6%，国民收入11.2%，职工工资年递增21.2%，1988年1~9月份，全国职工工资总额达1509亿元，比去年同期增长20.1%，其中奖金251亿元，增长46.6%。其结果是国家财政补贴大幅度增长，企业扩大再生产基金不足，消费基金迅速增长，社会总需求严